

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比较:现象·理念·实现

魏 争

(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比较中国和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教育,需要对国内外学术诚信教育认识的误区予以审视。通过对学术诚信现象的考察,剖析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差异与共识,从中西方高校学生的学业发展过程中找出差异产生的根源。对我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理念定位进行再思考,从而从中国高校实际的视角出发,思考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合理要素如何被创新性吸收。

关键词:学术诚信;诚信教育;比较研究;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22)01-0069-05

学术诚信(Academic Integrity)在高等教育中是一个永恒严肃的话题,它被视为一种学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学生学业发展和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底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对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都高度重视并且积极探索实践,以维护学术研究的公平公正性和学术成果的原创性价值。

中外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问题,由于较少涉及学术论文发表,主要表现在作业、报告、课程论文、考试等学业考察和考核过程之中,如美国常青藤联盟高校就把本科生学术诚信治理的范围分为两类,一类是考试不端行为,一类是作业不端行为^[1]。那么国内外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中有何差异?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对发展和培育我国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品质又有何启示?

一、惯性误区:重新审视中西方学术诚信教育

在本世纪初的十年间,中西比较德育研究总体上沿袭着“介绍+经验+借鉴”的研究思路 and 模式^[2],这一模式的背后有如下两个假设作为逻辑前提:一是西方发达国家道德教育的效果好,二是在这一假设下进一步分析德育效果好的原因,认

为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教育理念先进、教育体制健全、教育机制科学等。以诚信问题为例,在这一逻辑下,往往会对国内的诚信现象、诚信教育与管理情况得出以下先入为主的结论:从现象上说国内学术失信情况严重甚至堪忧;从本质上讲国内学术研究者和大学生的诚信观念落后,国内对学术诚信问题重视不够、监督不严、失信惩罚不足等等。

对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质疑:在不以个案来判定的前提下,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下本科生的学术诚信品质相去甚远?这一证据是否是在可比较的条件下进行比较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程序缺少了哪些必要步骤或者环节?缺乏实质性作为吗?国内学术失信惩戒措施仍然不够严格,失信成本真的不够大吗?倘若不经过深入考察和分析,以上问题的回答是不容易轻易做出的。

实际上,“介绍+经验+借鉴”的研究模式是一种可贵的学习态度,但是一旦破立界限拿捏不准,主体立场位置不当,就会忽视国内学术诚信教育的现实和具体情况,产生了不自信、不客观的倾向,导致盲目借鉴,无法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立足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实际的前提下,“为我所

收稿日期:2021-11-20

作者简介:魏 争(1981-),女,河北南和人,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师。

用”的应然向度和实然困境之间的矛盾使学术诚信教育实践存在难为境地,任何“事后诸葛亮”“只破不立”式的批判都无济于事,唯有持续的实践探索、反馈和调整,才能实现学术诚信教育从量变到质变的本质性进步。

二、现象考察: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异同

(一)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共性分析

基于对澳大利亚三所高校(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悉尼科技大学)本科生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生态的考察,中澳高校在诚信教育与管理文化根基、管理环节、制度支撑等方面存在共性特征。

首先,诚信作为一个道德范畴,在中西文化思想史上均可以找到其赓续不绝的文化基因,成为中澳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具有共性特征的基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论语·为政》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阐述的是诚信为本,诚信是做人立身的道德底线;“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表现的是诚实谦虚、治学严谨的求学态度;《荀子》中“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概括的是实践诚信,诚信是国家巩固的治国之道;“业无信不兴”形容的是守信经营、事业成功的价值导向。可见,我国古代把诚信作为立身、立业、立德之本,是社会道德评价的主要内容。西方诚信理念来源于贸易与经济,诚信既是公平的基础,又以公平为目的,推演至人际交往和国家荣誉等方面,诚信契约成为西方国家的一条重要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不论是东方智慧还是西方哲学,诚信都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3],这是中澳高校均高度重视学术诚信教育的文化根源。

其次,中澳高校在本科生诚信教育和管理环节和程序上均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诚信教育认知阶段,诚信行为管理阶段,失信行为处理阶段。诚信教育认知阶段是教育方通过宣传教育、组织学习、考察测试等方式让受教育者明白学术诚信的意义和重要性,使受教育者对学术诚信产生更加准确有效的认知,做到了解、理解和掌握;诚信行为管理阶段是在受教育者将认知阶段了解和掌握的诚信道德要求外化的过程中,教育方通过制度约束、行为监督等方式管理、养成受教育者的诚信行为,使受教育者在学业发展和学术研究中坚守诚信原则,行诚信之实。失信处理阶

段是对失信行为者进行处罚和处理,以规范失信者的行为,并对他人进行警示教育。这三个阶段遵循了道德品质从认知到行为的养成规律,有助于学术诚信品质的培育和发展。

再次,在这三个阶段中,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在制度支撑方面也有形式和方法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中澳双方均制定高校学术诚信管理相关制度和文件(如国内大学的《本科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和悉尼大学的《Academic Honesty in Coursework Policy 2015》《Academic Honesty Procedures 2016》),均包含相似的条款(如《Academic Honesty in Coursework Policy》内含“前言”“相关词条定义”“学术失信和剽窃”“学术诚信”“对学术失信指控的处理”“职责”“管理机构”;《本科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包括“适用范围”“违纪情形与处理”“处理程序”等,“处理程序”依照《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均在《学生守则》中明确列有诚信要求,均组织线上或线下的制度学习或测验(如国内大学的入学教育考试和悉尼大学的 Academic Honesty/Integrity Test),均依据相关制度严格管理考场上的违纪行为,失信后均从取消考试成绩直至开除学籍,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予以相应处理。

(二)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差异比较

中澳高校学术诚信的差异性是伴随在共性中的,是在共性特征框架下存在的细微差异。尤其是国内高校学术诚信事件中较少出现的特殊现象,差异性比较即需要考察这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中澳高校学术诚信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诚信行为表现、管理过程的细节和诚信教育引导方式等三个方面。

第一,从学术诚信行为表现上看。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为中澳双方高校的学生和学术研究者所珍视和遵循,然而与中国高校情况不同的是,澳大利亚高校的本地教师和学生(Domestic Student)不仅自身遵循这一价值观而行动,而且还主动捍卫诚信,纠正学术不诚信的行为和做法。如揭发翻印教材现象,他们认为翻印教材属于侵权行为;学生主动阻止考场上其他学生的违纪行为(如未经允许提前翻看试卷内容);学生揭发同组成员获取其他班级相同科目考题资料的行为,结果导致揭发者本人也被取消考试资格。如此现象在国内的学生看来可能是“多管闲事”,但从学

生本身都参与学术诚信监督的角度来说,澳大利亚高校的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更具有全员参与性。

第二,从学术诚信管理细节上看。澳大利亚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教育、管理和监督不仅体现在从新生入学到毕业的“大过程”,还渗透于每个学期期中和期末涉及学术成果的每一次“小过程”中。比如每一份课程论文或报告均需要提交作业查重系统(Turnitin 系统),作业查重率不得超过30%;每一次须小组独立完成的讨论作业各组之间不得出现雷同的解决方案;每一次实验课学生须按照作业锚点(Anchor Point)的要求在实验课程系统提交过程数据,系统自动进行计算,评估作业数据的偏差,这一锚点的设置可以迅速定位学生的实验课程进度,以此来证明参与课程学习情况,监督学生的学习行为等。微观过程上的监督,杜绝了学生认为只有期末考试不作弊就是诚信的观念,让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养成诚信的习惯。

第三,从学术诚信教育保障措施上看。澳大利亚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从教师管理和引导,借助系统和技术监督,提供学术诚信写作指导等各方面为学生提供明确的诚信行为指引。比如,新生入学的学术诚信规范考试以线上情景问答的方式列举了各类不诚信行为,把诚信的要求解释得更充分、更具体。如你抄自己的作业(Recycle your own work)算作弊吗?答案是“算”。教师在布置作业中明确说明作业完成方式中的诚信含义(如什么叫独立[individually]完成作业,即作业不允许请教同学,只能询问教师)。作业通过查重系统(Turnitin)查重。学校诚信委员会组织学术诚信写作工作坊,实施新生学术诚信教育模块^[4]等。据统计,参加过悉尼大学的学术诚信写作工作坊的学生比未参加过工作坊的学生的剽窃行为减少60%。方方面面的监督、辅助和引导让澳大利亚高校的学生在学业发展的每个环节和步骤中都体验什么是诚信,怎样做到诚信。可见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的关键因素。

可见,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实现了师生共同参与与捍卫,从每一项学业任务、每一份学业成果的细节入手,同时借助技术手段全程辅助学生学业发展过程中学术诚信品质培养。

三、根源审视:中澳学术诚信教育差异之归因

基于对中澳高校学术诚信行为表现、管理过程细节和诚信引导方式等方面差异性的实地考察,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国内鲜有学生揭发作弊的行为,国内可否实现教学过程中查重而非只是发表端查重等等问题,这类本质差异是比较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的关键切入点。从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的全员性、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三个方面来分析中澳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差别的根源,应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文化基因中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学术诚信教育与管理差异的根本原因。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是人们在社会、家庭和学校等环境中,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自我适应、接受下养成的。道德行为的养成主要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我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意”的作用,实质就是自律;而西方文化强调制度的约束。这一文化差别就导致了在我国即使人们鄙视失信行为,但很少出现“多管闲事”的情况,中国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失信行为获利的只是一时,最终总会受到惩罚。而西方人相信制度,愿意遵守制度的共同约定并捍卫制度以维护公平。同时,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个体文化,个体文化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独立的个体,个体的事由个体负责,个体的利益也需要由个体捍卫。不同取向的文化基因,导致与中国相比,澳大利亚本地教师和学生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的主观性和参与度上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高等学校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学术诚信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场域。以理工科专业本科为例,国内的本科教育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后作业通常是演算练习以巩固课堂学习,作业着重训练性强化,但原创性不足,考试侧重于考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而澳大利亚高校本科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为目标,翻转课堂模式基本成熟。比如莫纳什大学本科课堂教学前强调学生自学预习,在课下完成对知识点的识记,课堂通过教师对案例、难点应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拓展,再通过课程论文、实验、小组作业等方式开展具体的计算、操作、对比、分析、汇报等学习和思维训练(见图1),以实现知识的应用、分析、评价

和创造等目标。作业形式采取个人作业和小组合作作业的形式,小组内有分工,个人作业有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雷同作业和抄袭作业的

情况。不同的人才培养和教学互动模式使得对学业过程和结果的考察和考核侧重点各不相同,学术诚信教育和管理的方法设计也有所区别。



图1 莫纳什大学工程学院本科一年级课程分析(依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四、视角转换:立足中国高校实际的引进吸收

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教育生态的考察,发现中澳文化因价值取向不同有自律和他律、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之分,本科教学方式因各自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和阶段不同,而表现出注重夯实理论知识功底和注重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之别,再加上双方在硬件支撑和软件保障上有所区别,使得中澳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教育在文化共识、管理环节和制度相似的基础上,澳大利亚高校还在师生行为表现、教育管理细节等方面表现出全员参与性,全过程、全方位管理和监督等特点。但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5],澳大利亚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合理要素如何被创新性吸收是值得思考的,立足中国实际,既要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现实国情,又要坚持持续改革,日臻完善。

一方面要守正。依托文化自信,在充分认识我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的利弊成因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诚与信。另一方面要创新。抓住高等教育改革机遇,在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中设计好学术诚信教育的有效机制,构筑好学术诚信教育的有效保障。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论述的中国文化有“民主、自由、平等要求不见提出,法制不见形成”“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文化早熟”等“欠缺”,似乎对中国文化有批评之意,但中国“明明白白有无比之伟大力量”——文化理性,^[6]使得中国以伦理道德代替宗教,以历史长久

和民族融合抵御了近代外敌的侵略。依托文化自信,不是当作看不见缺点和不足,不愿意接受善意的批评,而是能正确认识这些不足,学会与之相处,取其精华,扬长补短。诚信道德文化的形成是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以人的不断实践为动力,逐步演化生成的,这是一个生成的逻辑,具有相对稳定性,既存在支持其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也会出现阻碍其发展的曲折和障碍,不能全盘否定,只可扬弃和超越。

我国高等学校学术诚信教育贵在有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血脉作为支撑,探血脉之精华,树道德之风气。然而,文化的信念力量不能代替规则和制度的约束,学术诚信品质的培养需要有效的诚信教育机制以促进诚信道德认知的形成,诚信道德情感认同的强化需要系统的管理机制以促成诚信道德行为的全过程落实,需要完善的诚信监督机制和失信处理程序以加强学术诚信制度执行的全方位有力。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规模和条件、管理体制、人才结构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仅庞大的学生人数即会使得同样的机制设计在执行上存在类似打折扣的“放大效应”。充分认识文化生成和道德养成的特点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有助于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提升文化自信,有助于把握好我国诚信道德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做到实事求是地结合实际具体分析、探索和实践解决现阶段问题的有效策略。

综上所述,正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之第十七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所说,用法治来规范、监督、促进公平正义,我国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品质的培育也应

如此。在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立场下,深化改革,守正创新,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律”和“自省”在制度和机制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保障。

[参 考 文 献]

[1] 张银霞.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本科生学术诚信治理模式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6(9).
[2] 上官莉娜,王晓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历程、议题与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4(8).
[3] 金建萍,杨谦.比较视域下诚信价值观的现代意蕴

[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4).
[4] 悉尼大学新生学术诚信教育模块(Academic Honesty Education Module)[EB/OL].(2018-10-05)[2021-09-25]. <https://sydney.edu.au/students/academic-integrity.html>.
[5]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B/OL].(2020-1-1)[2021-09-25].<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531147>.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Comparis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Phenomenon, Concept and Realization

Wei Zheng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Abstract: To compare th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there is need to examin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sensus of th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i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and find out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er thinks over about the concept positioning of th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us may think about how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of th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in Australian can be innovatively absorbed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academic integrity; integrity education; comparative study; cultural confidence

(责任编辑:张晓军)